

村庄民主与农民幸福

——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的数据分析

陈吉平¹, 赵丽敏², 任大鹏^{1*}

(1.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083;

2.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利用 2020 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的数据, 探讨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群体差异。研究表明, 村庄民主中蕴藏着幸福效应, 村庄民主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与此同时, 路径机制分析显示, 村庄民主可以通过增强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抑制基层腐败以及改善农村居民居住环境的主观感受等途径增进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此外, 异质性分析显示, 村庄民主可以显著影响高中学历以下、60 岁及以上以及完成了农村宅基地确权的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因此, 为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可以从重视村庄民主过程, 提升农民民主参与; 维护干群关系, 增进政治信任; 改善乡村人文环境, 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腐败治理; 关注老年群体的民主事项和农村居民的财产稳定性等途径着手。

关键词 村庄民主; 幸福感; 政治信任; 社区环境; 腐败抑制

中图分类号: C912.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24)05-0181-12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24.05.016

近年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民幸福感问题。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国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提升社会的整体幸福感^[1]。党的十九大报告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并提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见,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裕, 人们对精神需求的满足愈益重视, 更加关注“何为幸福”以及“如何幸福”。目前, 中国正处于由全面小康向共同富裕过渡的新时期, 如何增强农民的幸福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和重要议题^[2]。

在学界, 幸福感被视为“隐藏的国民财富”。关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相对丰富, 学界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对居民幸福感展开了研讨。总体而言, 主要聚焦以下几方面: 一是关于幸福感的定义讨论, 幸福感的讨论中, 主要受到边沁“快乐论”和亚里士多德“实现论”的影响。以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为主的学科将幸福看成是具有等级结构性的复杂心理活动, 认为幸福是个体的一种主观感受, 且主要包括对生活满意度、情绪及感情的评价^[3]。因此, 幸福感类型中, 主观幸福感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被学界较多采纳。且在民众幸福感的研究中, 多是以民众的主观幸福感的李克特量表进行表征的, 单项综合的幸福测量通常采用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或十分序列法等^[4]。二是关于幸福感的测度研究, 在定义讨论的基础上, 幸福感到底如何衡量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内容。

收稿日期: 2024-0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研究”(208ZD163)。

*为通讯作者。

其中,测度维度上,多元指标成为基本共识。Ryff等认为,幸福感应当包括良好关系、环境掌控、个人成长、人生目的、自我接纳以及自主性6种维度^[5]。Waterman等指出,幸福感是自我发现、生活目的、潜能感知、活动投入、人格展现和追求才智等方面的集合^[6]。三是关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居民个体特征来讲,研究显示,个体的性别、年龄、教育、健康等均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从居民的家庭特征来看,家庭人口数量、社会关系等都会影响其幸福感^[7]。从居民与组织的关系来看,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组织^[8]、社会文化组织^[9]以及参与村庄选举等对农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增益作用^[10];从居民与外部宏观环境而言,一方面,外在的自然环境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显著降低了农民幸福感^[2],反之,生态环境的改善可以显著促进农户幸福感的提升^[11]。另一方面,人文环境上,经济增长、收入差距、通货膨胀、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12]以及阶层认同^[13]、公共服务^[14]等宏观社会环境均显著影响着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诚如上文所言,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与其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作为乡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庄政治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嵌入在农户生活环境中。基层民主是我国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组织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15]。事实上,在农村经济社会不断变革的背景下,农村居民通过民主参与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6]。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基层治理的强调,村庄民主建设逐渐迎来了新征程和新高度。学界关于中国村庄民主与幸福感的研究不多,较早关注该话题的是陈前恒等^[17],其研究实证了村庄民主与农村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从民主内涵来讲,研究发现,相较于西方主流的程序民主,中国民众对民主内涵的理解更偏向于符合民本思想的实质民主,对实质民主的认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民主程度的满意度,进而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的增强^[18]。村庄民主实践中,农民参与村庄选举和村民大会均对其幸福感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0,19]。但已有研究中,只是对二者的关系以及异质性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未就民主幸福增益的路径机制作进一步讨论。基于此,笔者尝试以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村庄民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边际贡献主要为以下两点:其一,既往村庄民主与幸福感的研究中,对幸福感的测度大多采取主观幸福感进行测度,容易导致较大的测量误差;本文纳入更为丰富的含义,将农户幸福感的定义进行多维度嵌入,对农户的幸福感知进行更为细致的刻画。其二,现有文献对村庄民主与农民幸福感的研究已有探究,但关于村庄民主的幸福增益机制的分析还不甚清晰;本文在探讨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村庄民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边界与内容。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幸福感”被定义为个体在一个从积极到消极连续体上对其生活状态的整体评价和情感体验,主要包括个体的认知评价和某种程度的积极或消极情绪^[20]。关于幸福的研究,传统经济学认为,幸福增加的决定主要是财富的增长决定的。但“伊斯特林悖论”的核心观点指出,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甚至是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因此,居民幸福感不仅与财富收入有关,同时还与个体特征、生态环境,以及经济与政治环境有关^[7]。政治环境中,民主作为核心内容被广泛谈起。从民主实践的现实运作来看,民主制度的支持不仅需要公民主动地进行民主实践,而且需要公民对政府及其机构以及政治行为者的信任。这种政治信任在推进和维持民主实践中的地位 and 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塑造着政府认同,而且也塑造着民主实践的形式和民主实践的社会影响^[21]。基于民众政治生活的视角,这种社会影响关联着民众的幸福感知,是增进民众幸福的催化剂。当然,民主实践也不通常都是一帆风顺的,民主进程中的腐败滋生严重影响着民众生活福祉的期待和实现。事实上,腐败已成为全世界民主进程中共同面临的难题,且与各国政府绩效和民生福祉息息相关。新中国的民主进程表明,腐败治理与民众的幸福感知密切相关。反腐力度越大,所产生的幸福激励效应就越强^[22]。此外,政治环境的影响也直接或间接反映为居民社区环境的主观体验,进而影响着居民的幸

福感知。因此,基于民主的视角,“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环境依赖性特征,这种环境依赖性来源于民众对政治信任、腐败抑制以及社区环境的情感反应。

1. 村庄民主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在民主与幸福感的研究中,关于二者的讨论历来已久,相关研究显示,政治环境尤其是国家的政治体制与其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越高,其国民的幸福感越强。从民主制度的结果来看,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的决策和权力更可能贴近民意和受到监督,其民主运行的结果更有利于提升公众政治生活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民众的幸福感。从民主的过程来看,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普通居民有参与政治生活的需要,以表达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而民主制度赋予了普通国民政治参与的权利,为居民提供了影响政治过程与政策结果的工具,从而创造了“程序效用”。村庄作为国家的基层单元,村庄民主是国家政治的微观体现和基础支撑,其政治活动直接反映了国家政治在基层的贯彻与实践。村庄政治的稳定与否、民主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的稳定和民主化进程。同时,村庄民主也是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来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通过村庄政治的参与和实践,可以培养和锻炼村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能力,为国家政治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因此,村庄民主作为我国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农村居民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民主参与是人民群众在基层直接行使自身民主权利的过程,其结果既关乎农村居民切身生活,也关乎他们随时代不断发展的精神需求的满足^[16]。一方面,村庄民主可以增强村民的群体价值认同和个体自信。参与村庄的决策过程可以让农村居民感受到自己的意见和需求被重视和认可,从而增强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心。当村民们能够决定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时,他们会感到更有尊严和价值,这种群体认同感和个体自信的提升无疑会增进其幸福感。相关研究表明,参与的过程能够提高公民的民主技能与“政治效能感”^[23]。农民能够从民主参与中获得基于责任感、归属感的幸福满足。具体而言,农民能够通过村庄民主参与获得加强社会联系、满足表达自我、被人倾听、被人尊重的需求^[17]。这些积极的情感有助于农村居民获得“体验幸福”。另一方面,村庄民主参与可以提升村民的参与感与控制感。村庄民主提供了农村居民表达意见与诉求的渠道,使得他们有机会参与到决策过程中。这种参与过程让农村居民感受到村庄归属和主人翁意识,由此增加了村民的控制感。研究表明,控制感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控制感来源于特定领域的自我效能感,控制感会转化成一种持续的自信;当人们感到能够影响自己的生活和环境时,有助于减少消极情绪,从而提高幸福感^[24]。同时,村庄民主形成的结果,代表了多数人的诉求和意愿,参与结果表现为村庄民主参与的效能。因而,民主决议的参与和实施,有助于满足农民的参与诉求,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因此,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₁:村庄民主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2. 村庄民主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路径机制

(1)机制一:政治信任的中介作用。公众的民主参与是培育公民政治技巧、塑造合格公民的重要途径。公众参与可以增进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公众与政府的盲目对立,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此,公共管理者倡导公众参与的最重要目标就是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村民村庄民主参与对政治信任的提升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村庄民主参与有利于增进农村居民的制度认同。有研究表明,认同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推动居民持续参与村社公共生活的重要动力^[25]。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民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制度的价值基础与运作机制,有助于民众更好地理解 and 认同政治制度,从而提高其政治信任。其二,村庄民主参与有利于提高政体合法性。当政策决策过程中有民众的参与时,有助于提高其政策合法性,因此,村庄民主参与使得民众更加支持与认同政府的决策,进而促进了民众政治信任的提高。与此同时,村庄民主参与亦为民众提供了一种监督和问责政府的机制,促使政府更加负责和透明,这种监督和问责能够加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26]。其三,村庄民主参与有利于干群信息反馈与工作透明度。民众通过民主参与能够直接了解政府决策

过程和结果,从而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这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工作的信任,减少猜疑损耗。

制度安排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制度、政治活动参与以及民主的整体运行质量状况等。这些民主制度安排与运行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的满意程度,进而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产生影响^[27]。政治信任亦是如此,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产生出与其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是人们对政治体系和政府绩效、政治体系可信性的一种理性的评价^[28]。政治信任一般包含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和政府对工作人员的信任。政治学视角看来,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和对民主政体的支持,即政体的公众合法性是民主政体能够延续的必要条件^[29]。在我国农村,政治信任有着多层次的信任对象与内容,农民的政治信任主要源自对村干部和乡镇基层政府的信心^[30]。关于政治信任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也在诸多的研究中得到证实,祁玲玲等研究显示,在当下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稳定因素^[31]。李宝军等研究表明,政治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农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水平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32]。由此,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₂:村庄民主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进而增进村民的幸福感。

(2)机制二:腐败抑制的中介作用。腐败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长期关注的焦点话题,关于腐败的探讨经久未衰。腐败对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中,腐败抑制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已成为基本共识。大量研究证明,反腐力度越大,所产生的幸福激励效应越强^[22]。机制研究显示,腐败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多元的途径样态。从宏观环境而言,腐败会抑制经济增长,还扩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降低居民幸福感^[33]。同时,腐败还可能扭曲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而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跨国研究证实,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显著影响了居民幸福感^[34]。从微观视角来看,腐败的产生会影响和打击民众的民主参与热情,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反之,腐败水平的降低有助于增进社会信任,进而提升居民幸福感^[35]。在农村,政治腐败对民众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36]。在影响政治腐败的因素中,公众参与与公众监督是其重要变量。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指出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建设,让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对现代民主国家政府来说,政治信任构成了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民主参与制度确保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合法权利和途径,促进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逐渐培养了公众与政府间的稳定合作关系和信任感关系^[37]。公众的政治参与本身是一种广泛而有力的社会监督,这有利于克服各种政治机构的官僚主义,遏制政治腐败现象的滋长。对于基层政治而言,村民的民主参与能够有效保障村民的参与权利,使他们能够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这有助于增强村民的主体意识,促进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关注和参与,从而提高村级治理的透明度和有效性,有利于抑制腐败的滋生。由是观之,农村居民的民主参与有利于抑制基层政治腐败,进而促进了村民幸福感的提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₃:村庄民主可以通过抑制基层腐败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3)机制三:社区环境的中介作用。居民幸福感通常取决于其周边社会存在的主观或客观因素,并与住区环境密切相关^[38]。作为农村居民日常生活行为的空间载体,农村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更是一个社会经济概念,它涉及到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等。因此,农村社区环境无不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居住体验和幸福感知。乡村社会中,民主活动是影响其社区环境建设的重要之维。一方面,在乡村政治生态中,村民的民主参与有助于提高农村社区的治理效率。居民的政治参与可以促使政府更加关注社区的需求和问题,并及时解决社区面临的公共问题,这是营造良好社区环境的基础。另一方面,村民的民主参与能够影响地方政府和农村社区的政策制定,村民的话语表达被更多地纳入决策过程,从而使相关角色更加符合村民或农村集体的实际需求和利益,这些实际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有助于推动社区整体环境的改善。此外,通过参与政治,居民会更深入

地了解 and 关心社区环境问题,从而形成一种集体力量,共同推动社区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促进乡村的稳定与和谐,缓解乡村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良好的民主参与机制有助于形塑良好的农村社区环境。关于社区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已有研究多认为社区环境对幸福感存在显著正效应。Li等通过对北京、广州和上海的案例研究发现,社区内部的社会环境是影响居住环境感知的重要因素^[39]。从可达性的作用来看,提高文化、娱乐等设施的可达性有利于加强居民社交活动参与,进而提升幸福感^[40]。就邻里属性而言,良好的社区环境以及绿色宜人的开敞空间为人们创造了社交机会,既可以供给现实的资源互助,又能够给予情感性支持,缓解外部压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的负面效应^[41]。从中介效应来看,一方面,社会环境可以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42];另一方面,社区环境的质量会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舒适性与便利性,进而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43]。由此可见,村民的村庄民主参与有助于促进农村社区环境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的居住舒适感,进而实现其幸福感的增益。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₄:村庄民主参与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起并完成的一项全国大型农村追踪调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RRS)。该调查围绕“农村人口与劳动力”“农村产业结构”“农民收支与社会福祉”“农村居民消费”“乡村治理”和“农村综合改革”等农村发展的重要内容展开调查,课题组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第一期大规模农户和村庄调查于2020年8—9月在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安徽省、河南省、黑龙江省、贵州省、四川省、陕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10个省(自治区)开展,调查数据覆盖全国50个县(市)、156个乡(镇),共获得300份村庄调查问卷和3800余份农户调查问卷,搜集了1.5万余人的家庭成员信息。本研究通过指标选择、缺失值插补(邻近点的平均值)、极端值与异常值剔除,最终保留了3423个有效农户样本。

2. 变量说明

(1)自变量:村庄民主。在村庄民主研究中,学界常利用村庄选举作为村庄民主的衡量指标^[44]。同时,也有学者采用村民参与村民大会的频率进行村庄民主的表征^[19]。与村庄是否进行选举相比,参与村民大会的次数更能体现村民村庄民主的参与程度。因此,本研究采纳后者的衡量方法,采用过去一年村民参与村民大会的次数对村庄民主参与进行表征。

(2)因变量:幸福感。在民众幸福感的研究中,多是以民众主观幸福感的李克特量表进行表征的^[4]。不可否认的是,仅用主观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幸福感取向的内涵与外延,加之实际调研中受即时情绪的影响,也容易造成一定的测量误差。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具有还原论和简单化倾向,难以体现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学界也呼吁从多方面评估和揭示幸福的本质,推动幸福感理论的深入发展。基于此,农民的幸福感应是一个多维的复合概念,进而才能更好地刻画与阐释农民的实际幸福感。再通过已有研究中普遍采用的等权重方法,计算多个维度的均值,最终形成具有可比性的幸福感指标^[44],具体见表1。因此,本文以“民生三感”为基础,结合数据可得性,构建农民幸福感的多维指标。具体包括生活状况满意度、家庭生活幸福状态、家庭收入满意度、道路条件满意度、饮水状况满意度、网络条件满意度、医疗服务满意度以及社会治安满意度等8个指标,分别用五级李克特量表进行衡量。

(3)中介变量:①政治信任。政治信任一般包含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和政府对工作人员的信任。本土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中,一般操作化为公民对各级政府威信的认同度^[45]。同时,考虑到中国农村的地域特殊性,因此采用村民与村干部间的信任关系进行表征,变量为“您信任村干部吗”,具体包含“非常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五级李克特量表。②腐败抑制。选取中国乡村

表1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变量	变量释义	均值	标准差
生活状况满意度	对现在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赋值1~5	4.061	0.854
家庭生活幸福状态	您家现在的生活幸福吗/赋值1~5	4.159	0.823
家庭收入满意度	对去年家庭收入的满意程度/赋值1~5	3.543	1.060
道路条件满意度	对通村组与入户道路的路面条件满意吗/赋值1~5	3.997	0.962
饮水状况满意度	对当前饮水安全状况整体是否满意/赋值1~5	3.886	1.098
网络条件满意度	从网络得到的信息能否满足日常需求/赋值1~5	3.884	1.110
医疗服务满意度	对村/乡镇医院或卫生室的服务评价/赋值1~5	4.142	0.654
社会治安满意度	对本地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赋值1~5	4.400	0.664

振兴调查的题项即“您觉得基层村干部腐败问题严重吗?”进行识别。具体选项为“不严重=1;一般=2;比较严重=3;非常严重=4;不了解=5”。由于“不了解”表明村民对当前的腐败状态不清楚,即是说无法进行主观评价,因此不进行数字赋分。原有的五级量表调整为四级量表,即“不严重=1;一般=2;比较严重=3;非常严重=4”。③社区环境。社区环境指的是居民所在社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总和,中国乡村振兴调查访问了农村居民居住的整体感受,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可直接反映社区环境的质量,因而本文主要采用农村居民对所在居住社区环境的整体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具体用“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依次进行1~5五级赋值。

(4)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的研究,在村民个人层面,纳入了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民族、信仰、党员身份、干部身份、身体状况等个人特征^[19,44]。同时,还考虑了宅基地面积、耕地面积、土地流转、家庭收入等家庭特征变量。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3. 研究方法

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幸福感为连续变量,因此构建 OLS 模型考察村民民主参与对其幸福的影响。

表2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释义	均值	标准差
自变量			
村庄民主	参与村民大会的次数	2.938	2.840
因变量			
幸福感	综合指数/1~5赋值	4.009	0.514
中介变量			
政治信任	对村干部的信任水平/1~5赋值	4.304	0.775
社区环境	居住环境满意度/1~5赋值	4.093	0.833
腐败抑制	基层干部腐败问题严重吗/1~4赋值	1.338	0.632
控制变量			
收入	家庭收入(取对数)	4.673	0.481
性别	男=1;女=0	0.760	0.427
年龄	实际年龄/岁	57.12	11.17
民族	汉族=1;少数民族=0	0.870	0.337
信仰	有信仰=1;无信仰=0	0.130	0.336
受教育水平	未上学=0;小学=1;初中=2;高中=3;专科=4;本科及以上=5	1.779	0.997
党员身份	党员=1;非党员=0	0.254	0.435
村干部	是=1;否=0	0.161	0.368
健康	与同龄人相比的健康状态如何/1~5赋值	3.576	0.923
宅基地面积	单位/平方米	239.0	210.7
耕地面积	单位/亩	21.08	73.50
土地流转	流转=1;未流转=0	0.538	0.499

$$Happiness_i = \alpha_0 + \alpha_1 Democratic_i + \alpha_{2n} Control_i + \epsilon_i \tag{1}$$

式(1)中, α_0 为常数项, $Happiness$ 为因变量,表示第*i*位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Democratic_i$ 表示农村居民*i*的民主参与情况, $Control_i$ 表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控制变量。 α_i 为待估参数, ϵ_i 为随机干扰项。

为检验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构建了模型(2)。采用江艇的两步法建议^[46],设置了政治信任、社区环境和腐败抑制三个中介变量,这些中介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理论上存在较为直观的因果关系,不需要再采用正式的因果推断方法去判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两步法重点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以及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机制检验。若式(1)和式(2)两个系数均显著,则说明存在机制变量表征的传导路径。

$$M_i=\beta_0+\beta_1Democratic_i+\beta_{2n}Control_i+\epsilon_i$$

(2)

三、实证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3显示了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估计结果,模型1是村庄民主参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从表3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没有加入其他变量情况下,村庄民主与农村居民的幸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是加入了村民个体特征后的估计结果,回归显示,村庄民主参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仍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3是进一步加入了村民的家庭特征,估计结果表明,村庄民主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仍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所有实证结果中,村庄民主参与的系数均为正,且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村庄民主参与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得到验证。

2. 中介机制检验

在直接效应的基础上,就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中介机制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具体从政治信任、腐败抑制和社区环境三个中介机制展开,分析结果见表4。

政治信任方面,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村庄民主与政治信任的回归系数为0.014,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村居民的民主参与可以显著提高其政治信任。在政治信任与幸福感的研究上,相关研究证实,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直接影响其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1]。李宝军等对农民幸福感的研究表明,政治信任与农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32]。

因此,村庄民主参与可以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进而增进农村居民的幸福,得到验证。

腐败抑制方面,表4中的实证结果表明,村庄民主具有显著的腐败抑制效应,随着村民民主参与的提升,其腐败抑制效果越好。腐败与居民幸福感息息相关,张国林等研究发现,腐败会显著降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腐败可以通过显著降低民生性支出的比例,进而降低居民幸福感^[36]。且相比于其他群体,腐败对低收入居民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降低更为明显^[47]。基于此,村庄民主可以通过抑制腐败进而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成立。

社区环境方面,回归结果显示,村庄民主对社区环境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的社区环境感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民越是民主参与,其社区环境满意度越高。社区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方面,大量研究证明社区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李超等研究表明,社区环境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48]。通过构建和谐共处、邻里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村庄民主	0.0155*** (0.003)	0.009*** (0.003)	0.010*** (0.004)
收入		0.154*** (0.020)	0.157*** (0.021)
性别		-0.003 (0.028)	-0.001 (0.029)
年龄		0.005*** (0.001)	0.005*** (0.001)
民族		-0.047*** (0.031)	-0.050 (0.032)
信仰		-0.008 (0.030)	-0.101*** (0.031)
受教育水平		-0.010 (0.011)	-0.014 (0.011)
党员身份		0.105*** (0.023)	0.111*** (0.024)
村干部		0.034 (0.026)	0.040 (0.028)
健康		0.125*** (0.010)	0.126*** (0.010)
宅基地面积			0.000 (0.000)
耕地面积			-0.000 (0.000)
土地流转			-0.002 (0.020)
样本量	3422	2814	2606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表4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N=2606

项目	政治信任	T值	腐败抑制	T值	社区环境	T值
村庄民主	0.014*** (0.006)	2.43	-0.016*** (0.005)	-3.29	0.012** (0.006)	2.00
个人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和睦、治安状况良好的村庄环境能够保障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进而提升居民的幸福感^[49-50]。综上,实证结果支持了H₄,即村庄民主可以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社区环境进而促进村民的幸福增益。

3. 内生性讨论

农村居民的村庄民主参与与其幸福感知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幸福感知越高的民众可能更愿意参与村庄民主。因此,有必要对本研究的内生性问题进行讨论,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选取同县内部被访农户所在行政村的民主参与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个体民主参与水平与同村其他农户的民主参与水平有密切联系,满足相关性假设;同时,其他农户民主参与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农户的幸福感,确保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具体情况如何,则还需要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具体采用2SLS方法进行估计。根据表5结果,一阶段F值超过了100,远大于10,表明所选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村庄民主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村民民主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H₁进一步得到了验证。

表 5 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 N=2606

项目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村庄民主	—	0.038*** (0.010)
IV	8.761*** (0.830)	—
个人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F统计量	111.495	—

4.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了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一,替换因变量。借鉴已有的研究,将因变量“幸福感”替换为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满意度”^[48]。回归结果显示,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其结论与上文基准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其二,改变样本容量。在现有10个省(自治区)的样本范围中,随机剔除某一省(自治区)的样本数据,本文随机选取了黑龙江省的数据样本,剔除的样本量为343。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村庄民主依然正向影响村民的幸福感知,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可见,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了基准回归的可靠性。

表 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4/更换因变量	模型 5/改变样本容量
村庄民主	0.013** (0.006)	0.011*** (0.004)
收入	0.148*** (0.035)	0.147*** (0.023)
性别	0.039 (0.048)	-0.002 (0.030)
年龄	0.011*** (0.002)	0.004*** (0.001)
民族	-0.125** (0.053)	-0.034 (0.034)
信仰	-0.155*** (0.052)	-0.101*** (0.033)
教育水平	-0.041** (0.019)	-0.015 (0.012)
党员身份	0.169*** (0.040)	0.100*** (0.026)
村干部	0.073 (0.046)	0.035 (0.029)
健康	0.188*** (0.016)	0.126*** (0.011)
宅基地面积	0.000 (0.000)	0.000 (0.000)
耕地面积	0.000 (0.000)	0.000 (0.000)
土地流转	-0.032 (0.033)	0.011 (0.021)
样本量	2606	2320

四、进一步分析:异质性

异质性分析能够更为深入理解研究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同群体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经历和行为,对这些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现象的本质。农村居民的差异化研究中,个体特征差异通常是学者关注的典型话题。其中,个体的人力资本差异、基于年龄的代际差异等是经典异质性分析指向。人力资本差异通常用个体的受教育水平进行表征,代际差异通常用年龄进行划分。除此之外,个体的财产特征也是异质性分析的重要指向。本文从财产稳定性的视角关注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房权与地权的稳定是影响其财产稳定性的核心要素。由于我国乡村的土地确权颁证已基本完成,而宅基地的确权颁证很多地方还在实践探索中,因此,农村居民财产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宅基地的确权上。基于此,异质性分析主要从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差异、代际差异以及财产稳定性差异等视角展开。

1. 人力资本差异

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见表7),村庄民主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幸福增益差异。村庄民主对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敏感,且在1%的水平上显

著;相反,村庄民主对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是,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村居民在信息获取和认知能力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在社交网络和社区支持上可能更加依赖村庄民主。因此,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村居民可能更加重视与社区的融入和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的满足与村庄民主的开展情况密切相关。相比之下,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村居民可能拥有更多的个人资源和社交网络,且更多关注个人发展,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度相对较低,对村庄民主的支持系统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对村庄民主的感知不显著。

表7 异质性分析

变量	人力资本		宅基地确权		代际差异		
	高中以下	高中及以上	确权	无确权	40岁及以下	40~60岁	60岁及以上
村庄民主	0.0121*** (0.004)	-0.003 (0.009)	0.011*** (0.004)	0.008 (0.010)	0.013 (0.016)	0.006 (0.005)	0.014** (0.00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2. 财产稳定性差异

财产稳定性方面,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有宅基地确权颁证的农户中影响显著,而对没有宅基地确权颁证的农户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有宅基地确权颁证的农户在村庄中拥有相对稳定的财产权利,因此更有可能参与到村庄的民主决策中。通过参与民主决策,这些农户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提高了对村庄民主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最终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同时,拥有宅基地确权颁证的农户通常对村庄的归属感更强,更有可能将自己的利益与村庄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种归属感有助于增强农户对村庄民主的认同感和参与意愿,从而提高幸福感。相较而言,没有宅基地确权颁证的农户可能由于缺乏稳定的财产权利,对村庄民主的参与度和认同感相对较低。因此,宅基地确权颁证对这部分农户的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3. 代际差异

在样本分布的基础上,以受访者年龄为基准,大致分为40岁及以下、40~60岁、60岁及以上三个年龄段。分析结果显示,村庄民主对农村青、中壮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而显著影响着农村高龄居民的幸福。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期望也会发生变化。农村高龄居民可能更加注重传统的社区价值观和归属感,而村庄民主作为一种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能够满足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期望。而农村青、中壮年居民相对具有较强的行动能力和社交网络,其生活更多依赖城市的社会系统,因而对村庄民主的依赖程度和关注度都相对较低。

五、结论与启示

农民幸福感知在个人和农村社会发展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基层民主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村庄民主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揭示了其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研究显示,村庄民主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且在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益作用,可以通过提升政治信任、改善农村社区环境以及腐败抑制等路径机制得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特征农户群体中呈现了差异化特征。村庄民主可以显著影响高中学历以下、60岁及以上以及完成了农村宅基地确权的农村居民的幸福。

本文研究结论肯定了村庄民主对提升农民幸福感的增益效应,并从政治信任、社区环境以及腐败抑制等途径揭示了村庄民主对提升农民幸福感的实现机制。尽管考虑了农民幸福感的多维性,但与既有研究一致的是,本文又进一步证实了村庄民主对农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在基本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幸福效应的何以可能与群体差异,这对政策的改进提供了视角与路径。由此,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其一,重视村庄民主过程,提升农民民主参与。长期的发展中,我国的民主制度与民主形式已经十分成熟。因此,相较于民主形式,民主过程更能彰显我国村庄的民主

实际与价值。要充分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要积极拓展民主参与渠道,通过建立村民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组织形式,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基层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微信群、公众号等,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参与渠道,切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其二,维护干群关系,增进政治信任。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积极打造干群关系增益机制,进而提升政治信任。一方面,转变干群思路,促进乡村治理实现由管理到服务转型。即坚持以服务为导向,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意愿,实事求是,推动干群关系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促进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公开涉及群众利益的政务信息,提升政务信息的及时性、透明性与准确性。同时,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交流。通过座谈会、走访、线上交流等方式,与群众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增强互动与互信。其三,改善乡村人文环境,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一方面,可通过制定乡规民约、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等方式,促进乡风文明。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消除不良风气,营造和谐文明的乡村氛围。另一方面,加强公共文化建设。强化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文化产品服务供给,切实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引导与鼓励村民参与,提高其文化参与度和归属感,进而提高幸福感。其四,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对基层干部和代表进行有效监督和评价。通过设立举报电话、信箱等方式,鼓励农民积极参与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行为,不断推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其五,关注老年群体的民主事项和农村居民的财产稳定性。我国农村居民正发生着深刻的群体分化现象,农民幸福治理中,要重视农民的异质性差异。民主决议事项上,要与农村的老龄化人口结构相适应,村庄民主事项可以适度地向老年群体倾斜,更多地将老年群体的需求纳入到村庄民主的治理事项中,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与参与。财产稳定性上,全方面构建农村居民财产稳定性的幸福基础,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宅基地确权工作,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提升农民的安全感,进而提升农民幸福感。

参 考 文 献

- [1] 陈之常,马亚东.中国城市更新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遗传算法投影寻踪和面板空间分位数模型[J].管理评论,2022,34(8):43-53.
- [2] 潘丹,胡启志.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9):119-131.
- [3] CLARK A E, FRIJTERS P, SHIELDS M A.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8, 46(1): 95-144.
- [4]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82-102, 207-208.
- [5] RYFF C D, SINGER B H. Know thyself and become what you are: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8, 9(1): 13-39.
- [6] WATERMAN A S, SCHWARTZ S J, ZAMBOANGA B L, et al. The questionnaire for eudaimonic well-being: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demographic comparisons, and evidence of validity[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0, 5(1): 41-61.
- [7] 种聪,岳希明.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感提高?——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20(4):24-45.
- [8] 刘同山.农民合作社的幸福效应:基于ESR模型的计量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7(4):32-42.
- [9] 范红丽,杨嘉乐,张晓慧.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22(4):170-184.
- [10] 罗必良,吕姝颖.农民幸福感:来自村庄选举投票的证据[J].学术研究,2022(7):91-97.
- [11] 郑沃林,洪炜杰,罗必良.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增进农民幸福感——基于经济收入—社会网络—生态环境框架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6):140-151.
- [12] DOLAN P, PEASGOOD T, WHITE M.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8, 29(1): 94-122.
- [13] 许海平,张雨雪,傅国华.绝对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的微观经验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20(11):56-71.
- [14] 周绍杰,王洪川,苏杨.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J].管理世界,2015(6):8-21.

- [15] 周春平.收入、基层民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1863个样本的证据[J].人口与发展,2015,21(1):59-67.
- [16] 罗明忠,刘子玉.互联网使用、阶层认同与农村居民幸福感[J].中国农村经济,2022(8):114-131.
- [17] 陈前恒,职嘉男.村庄直接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14(6):59-70,95-96.
- [18] 石磊.民主与幸福感——解析中国的民主幸福感现象[J].青年研究,2018(3):55-67,95-96.
- [19] 臧敦刚,余爽,李后建.公共服务、村庄民主与幸福感——基于民族地区757个行政村31615个农户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3):79-87,111-112.
- [20] 罗必良,洪伟杰,耿鹏鹏,等.赋权、强能、包容: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J].管理世界,2021,37(10):166-182,240.
- [21] 林玲.政治信任与民主实践:基于CSS2019的实证检视[J].浙江社会科学,2023(7):81-87,103,158-159.
- [22] 柳建坤.“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民众的幸福感——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治理研究,2019,35(1):104-113.
- [23] 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 [24] BALTES P B.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of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on the dynamics between growth and decline[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9,23(5):611-626.
- [25] 颜玉凡,叶南客.认同与参与——城市居民的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的逻辑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9,34(2):147-170,245.
- [26] 董学,王洪树.党内监督:培育党内政治信任的重要路径[J].探索,2017(4):107-113.
- [27] LIU Y Q,ZHANG F Z,WU F L,et al.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s in Guangzhou, China: the impacts of the social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J].Cities,2017,60:333-342.
- [28] 王韶兴.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百年探索[J].中国社会科学,2017(7):4-28,204.
- [29] 王正绪.政治信任研究:民本主义的理论框架[J].开放时代,2022(2):179-193,9.
- [30] 裴志军.自我效能感、政治信任与村民选举参与:一个自治参与的心理机制[J].农业技术经济,2014(7):49-58.
- [31] 祁玲玲,赖静萍.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J].学术研究,2013(7):52-58.
- [32] 李宝军,王博,罗剑朝.社会经济保障、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22(12):165-175.
- [33] HELLIWELL J F,HUANG H F.How's your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linking good government and well-being[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8,38(4):595-619.
- [34] KOTAKORPI K,LAAMANEN J P.Welfare state and life satisfaction:evidence from public health care[J].Economica,2010,77:565-583.
- [35] 韩冬临,黄种滨.政党竞争、反腐败与政治信任:基于东亚四国的比较分析(2006~2014)[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2):113-124.
- [36] 张国林,任文晨.腐败、民生性支出与居民幸福感[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5,35(9):3-14.
- [37] 官永彬.民主与民生:民主参与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实证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5(2):26-37.
- [38] DONG H W,QIN B.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and mental wellbeing: a case study in Beijing, China[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7,164:71-80.
- [39] LI Z G,WU F L.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China's informal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J].Urban geography,2013,34(7):923-949.
- [40] LEYDEN K M,GOLDBERG A,MICHELBAACH P.Understanding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ten major cities[J].Urban affairs review,2011,47(6):861-888.
- [41] 王丽艳,段中倩,王振坡.居住环境、通勤时间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天津市微观调查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20,27(2):103-110.
- [42] 刘晓菲,王振波,宋静,等.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深圳混合居住区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22,41(11):2099-2107.
- [43] ARIFWIDODO S D,PERERA R.Quality of life and compact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Bandung, Indonesia[J].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2011,6(2):159-179.
- [44] 罗明忠,陈伟漫,林玉婵.民主参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知的调节效应[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10-122,207.
- [45] 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1):96-117.
- [46]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47] 陈刚,李树.管制、腐败与幸福——来自CGSS(2006)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文汇,2013(4):37-58.
- [48] 李超,万海远.贫民住区改造与主观幸福感——基于辽宁省六市的抽样调查[J].财贸经济,2013(6):117-127.
- [49] 刘斌,李磊,莫骄.幸福感是否会传染[J].世界经济,2012,35(6):132-152.
- [50] ETTEMA D,SCHEKKERMAN M. How do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Comparing the effect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J].Travel behaviour and society,2016(5):56-67.

Village Democracy and Farmer Well-being

——A Data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HEN Jiping, ZHAO Limin, REN Dapeng

Abstract Enhancing farmers' well-being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Using data from the 2020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RR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village democracy on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the mechanism and group differences of this impact.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village democracy has a happiness effect and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Pathway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village democracy can improve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by enhancing their political trust, suppressing corrup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improving their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village democracy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with less than a high school education, those aged 60 and above, and those who have completed the confirmation of rural homestead property rights. Therefore, to enhance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we can focus on valuing the process of village democracy, promoting farmers'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maintai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rural officials and residents, enhancing political trust to foster political trust, improving the rural cultural environment,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villages, refining supervisory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and addressing democratic matters relevant to the elderly and ensuring property stability for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 village democracy; well-being; political trust; community environment; corruption inhibition

(责任编辑:余婷婷)